

社会资本与重建参与⁽¹⁾ 灾后恢复过程中的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

罗家德 · 方震平

摘要

本文尝试运用一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汶川地震灾后恢复过程中影响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的因素。本文将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一类是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经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如果深深嵌入在关系网（工具网、情感网）的小圈子中对基层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有负面作用；对本村有较高认同感的村民参与自组织的社区志愿性活动的可能性更大。而村民的干部关系网对村民的社区志愿性活动呈现负面作用，只能促使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却不利于村庄自组织力量的发育。这些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对灾后恢复过程影响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基层政府在灾后恢复和村庄发展中的作用与自身定位。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参与基层政府自组织灾后恢复

Social Capital and Self-Organization: A Study on Government and Self-Organized Activities in a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rocess

LUO, Jar-Der FANG, Zhenping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factors as to why villagers participated in self-organized activitie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We first divided post-disaster recovery activities into two categories: self-organized and organiz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rough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self-organized network of villagers (emotional support network)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government-organized activities. In contrast, those who have more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re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community activities, but are more likely to join in government-organized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network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organization in these villages. These results help us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network on the proces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but also the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fter a disaster.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local government; self-organization; post-disaster recovery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因此，灾后恢复一直是政府与受灾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自然灾害，社会学者们更关注灾害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的社会性因素，而不仅是灾害的物理性后果。自然灾害只有作用于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系

统产生重大影响时才能被称作“灾害”（disaster）（Tierney, 2007）。灾害是造成正常的社会功能紊乱的一系列事件，“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功能”（Moore, 1958），使“常规的社会行为模式不再有效”（Killian, 1954）。昆兰特里认为：“与其说存在纯粹的自然灾害，不如说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而导致了所谓灾害发生。”（Quarantelli, 1989）吉尔伯特亦指出“灾害是其所在社会的函数，而不是其本身的函数。”

(Gilbert, 1998)

“5·12”汶川大地震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5·12”特大地震可被视为“破坏实验”(breach experiment)。根据常人方法学的观点，非常规的社会状态更能显露社会结构的形貌与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它使社会学家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将灾害视为一种巨大扰动力量，在非常规社会状态下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作(Tierney, 2007; Dombrowsky, 1983)。

在灾后恢复的复杂过程中，各级政府、NGO以及村民自组织⁽²⁾(self-organization)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不同类型的组织和社会成员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价值。“5·12”地震之后，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整个科层体系都被动员起来进行灾后重建工作，大量NGO组织、志愿者和企业也深入到乡村，成为灾后恢复的重要力量。

本研究团队自2008年开始，在四川地震灾区进行了一系列田野研究和问卷调查。在田野研究中发现，作为灾后恢复的基本主体之一，乡村社区成员在参与灾后恢复的过程中会被不同类型的组织动员。有些村民倾向于参与由村民自发组织或由志愿性团体/NGO发起的恢复活动⁽³⁾，有些村民却对由政府动员的恢复活动情有独钟。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村民参与自发组织的灾后救援或重建活动的总体参与比例为29.6%、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救援或重建活动的总体比例为18.5%。

许多研究发现，受灾者在灾后会利用自己的亲属、邻居和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支持，这对受灾者生产生活的恢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Drabek& Key, 1984: 105; Soloman, 1986)。自然灾害因其巨大的破坏力量，常常导致受灾地区正式制度系统运行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可以起到填补正式制度真空的作用(赵延东, 2007)。而中国的情况是，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各级政府往往是第一时间动员大量的物质与社会资源进行抢险救灾活动，成为抢险救灾活动以及灾后恢复活动的主导，但较多的人却仍参与了自组织的重建救灾活动，而较少参与政府发起的活动。从参与者的年龄看，政府动员最多的是30-50岁的村民，在这一年龄层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村民参与率相差不多，在其它年龄层中，自组织活动参与率明显高于政府组织的活动。另外，在调查中发现，同

时参加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搜救或重建活动的村民很少，只有总数的5.20%，参与自发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的村民基本不会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反之亦然。约近一半的乡村社区居民参加了灾后的集体救援及重建活动，其中却只有九分之一的人两类组织活动都参加，却用近九成的人只参加一边，这表明，参与灾后恢复活动的人群存在着区隔，这种区隔的原因是什么，又有怎样的社会意涵？

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与参与自组织活动并不必然相斥，比如，Schafft与Brown(2000)对匈牙利的少数民族自治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自治组织与地方政府对社区成员的组织动员效果并非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假如少数民族自治组织的领导者处于地方政府的人际网络中，能策略性地利用其中的各种资源，并在地方政府与社区成员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地方政府对该社区成员的动员能力就会较强，在该社区中的行政效能也会较高。

在灾后恢复的特殊情境下，非正式制度或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将社会成员动员起来，此种来自民间的动员与来自政府的动员有何不同，社区既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基层政府是如何影响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活动的。本文欲利用经验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理论探讨与假设提出

(一) 认知型社会资本——社区认同在灾后重建动员中的作用

对于人们在灾难发生之后的社会行为，一直存在着不少误解(misconception)与迷思⁽⁴⁾，即面对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灾区将立即进入“混乱”状态。灾民陷入恐慌，只能无助地等待救援和完全依赖于政府提供和维持必须的社会秩序(Quarantelli, 1960)。从现实情形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中国各级政府所代表的正式制度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的确不可替代。这也使研究者往往会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的作用，例如灾难中的政府决策、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政府如何动员资源、政府行政体系如何对灾难进行治理、地方政府之间的对口援建模式(王颖、董垒, 2010)和重建过程中的宅基地政策(陈开琦, 2009)等。这一类研究可称为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灾害研究。

在正式的国家与政府救灾行为之外，灾难之后的社会运作以及因灾难而浮现的社会自主性(social

autonomy) 对于灾后恢复也同样非常重要。在灾难发生时, 最先动员起来的并不是国家机器的任何一环, 而是能够迅速集结起来的各种自发性组织 (赵延东, 2007)。Patterson 等人通过对美国卡崔纳 (Katrina) 飓风灾害的研究发现, 在南路易斯安那地区的犹太人社区的成员对社区有很强的认同感, 具有较高的凝聚力, 灾难后能够很快进行自我组织的重建 (Patterson, et al., 2010)。日本学者 Nakagawa 和 Shaw (2004) 通过对神户大地震的社区恢复研究发现, 当地的人际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在灾后恢复中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这就使不少的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社区参与的问题。

广义而言, 社会资本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类, 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及其所蕴含的互惠性 (reciprocities), 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共同目标的达成 (Schuller, et al., 2000 : 1-5)。此外, Nahapiet 与 Ghoshal(1998) 以及 Tsai 与 Ghoshal(1998)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个层面, 分别为: 社会 / 组织成员透过关系网络的长期互动, 建立的关系层面 (relational) 的社会资本; 组织内的因社会关系 (social ties) 而结成网络型构 (network configuration) 的结构层面 (structural) 的社会资本; 社会 / 组织成员建立共同规则、共同语言、共同经历 (narratives)、共识与认同感的认知层面 (cognitive) 的社会资本。

社区凝聚力较高、有良好认同感的社区, 在缺乏政府资源与支持的情况下, 能够自发组织起来, 通过集体行动, 迅速有效地依靠社区自组织进行灾后恢复。这种灾后恢复活动可以视为一种“社区志愿性活动”, 而这种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基于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之上的。有研究者亦指出, 社区成员对于其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种认知型社会资本, 它促使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 (Uphoff, 1996 : 102-116 ; Nahapiet & Ghoshal, 1998), 基于理论分析和田野调查, 本文期待统计分析支持如下假设:

假设 1: 村民的本村认同感越高, 参与社区灾后恢复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二) 关系型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Paul (1987 : 2-10) 将社区参与定义为一个积极的社会过程, 即在一定区域内, 结合社区成员, 凝聚社区意识。在此过程中, 成员彼此交往并参与社区事务, 或设法解决社区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社区参与的特点是, 由草根性的组织团体采取由下而上的运作逻辑, 而非由官方或专业人员主导或介入执行 (Sheng,

1989 : 58-60)。对于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的探讨, 有的侧重对社区领袖在社区参与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 (Plummer & Taylor, 2004a), 有的是分析社区成员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对其社区参与的影响 (蔡宏进, 1985 : 54-78)。

宏观社会资本的概念被运用在社区的范畴中则是以社区既有之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 强调社区所共有的行动能力 (Gittel & Vidal, 1998 : 15 ; Green & Haines, 2002 : 37-45)。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生活的特征, 包括网络 (networks) 与信任 (trust), 能够促使参与者更有效的合作, 追求共同的目标 (Putnam, 1995)。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和社区 / 公民参与息息相关, “若社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彼此合作、形成集体行动将会更加容易” (Putnam, 1993), 因此互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协力与信任, 对社区参与而言至关重要。

社会关系可以分为情感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 情感性关系意味着影响力 (Krackhardt, 1992), 一个在社区中情感性关系多的人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去动员别人参与社区活动, 同样的, 紧密的关系也意味着限制性 (constraint; Burt, 1992), 所以容易被乡亲邻里所动员去参加社区活动。工具性关系规模大意味着平常较常找人帮忙, 找的人数较多, 在中国人情交换法则 (Hwang, 1987) 的背后, 这类关系会使人有较多的人情帐, 所以在被动员参与活动时, 比较容易在人情交换的要求下有所行动 (Luo, 2005)。基于理论分析和田野调查,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1: 村民既有的社区关系网络规模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假设 2-2: 村民之间的信任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三) 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如果一个人社会关系网中强关系多, 则此网络会变成相对封闭而且密度很大的网络 (Granovetter, 1973), 而封闭会带来社会资本, 主要是因为封闭网络中往往人与人相互直接熟识, 可以容易地相互监督 (Coleman, 1990)。如果群体中有很强的共同规范, 则任何违反规范的行为都很容易被监督察觉并被惩罚, 这是承诺的关系 (committed relations) (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 ; Yamagishi, et al., 1998)。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中, 网络成员相互监督, 很容易一起加入集体行动。在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测量中, 本文选取了亲戚、邻居为强关系, 强关系在社会

网中的比例高意味着受访者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关系网中，这类网络密度大，限制性高，所以一个人较少自由地不与其他人的行动，因此他/她社区活动参与的机率较高。

假设 3：村民既有的关系网络中，强关系比例（网络中的亲戚、邻居的比例）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四）个人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西方学界在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方面的相关议题，主要关注社区成员的信任结构是偏重强信任还是弱信任，或社会资本的形态是内聚型还是桥接型⁽⁵⁾，但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社区而言，基层政府是直接影响社区的重要力量。目前学界对于基层政府如何影响社区参与和社区自组织的实证性研究比较少，本文尝试把基层政府这一要素纳入社区动员与参与的分析中。汤京平等人（2009）基于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某社区重建的田野研究发现，政府对灾后社区重建与发展的扶持可能会产生“意外后果”，即社区部分成员和政府干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可能会对因互惠、信任与认同而形成的村庄自组织产生抑制效果，从而不利于社区成员参与自发性、志愿性和公共性的重建活动。作者在汶川地震灾后对 YL 村等几个村庄的田野观察中发现，与较多“政府干部”熟识的那部分村民对于社区自我组织的恢复活动参与较少，而往往乐于参加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

除了干部关系网之外，使用位置生成法的拜年网也是衡量村民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村民的拜年网规模越大，给村民带来资源的可能性也越大，村民越有能力参与社区活动，对社区的利益就会越关心。

基于理论分析和田野调查，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1：干部关系网（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对村民的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负面作用；

假设 4-2：干部关系网（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对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假设 4-3：拜年网（网络规模）对村民的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假设 4-4：拜年网（网络规模）对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清华可持续性乡村重建研究

团队 2009 年 4 月至 8 月在四川什邡市、绵竹市⁽⁶⁾等地震灾区组织实施的一项问卷调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问卷调查没有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的抽样方法，而是根据村庄规模、受灾严重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使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选取了 17 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 33 户，每户使用 KISH 表抽取 1 名成人进行问卷填答。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558 份。调查问卷不仅收集了村民家门面的数据，还收集了村民社会网络的相关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从受灾严重程度的角度看，三个调查地具有较大相似性，但是茂县与什邡市和绵竹市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茂县是羌族聚居地，山区居多，什邡市和绵竹市的居民汉族居多，地形多为平原。本文虽不是随机抽样，但多个不同典型个案的加总，可以增加推论的有效性。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地点进行问卷调查，是因为如果从理论梳理和田野观察提出的假设能够被多个受灾地区的调查数据验证，则更能说明本文提出的一些命题与假设在受灾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二）研究变量

1. 因变量

本文研究探讨的是在灾后恢复的事件情境下，村民参与村庄灾后恢复活动的影响因素，特别关注社区既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基层政府在灾后恢复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将村民参与的“灾后恢复活动”界定为：搜救伤亡人员、清理废墟、搬运物资、协力建房和照顾村里小孩老人等具有社区性、公共性和互助性的活动。一部分村民参与的搜救和重建活动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是村民的自组织力量和村庄的凝聚力的体现，可视为具有互助性质的社区行为；另一部分是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搜救和重建活动，主要是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体系和村民的干部关系网络对村民进行动员。因而，本研究把“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情况”设置为因变量，赋值为：未参加 = 0，参加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 = 1，参加由村民自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 = 2。结果显示 57.1% 的样本未参加任何灾后恢复的活动，18.50% 的人参加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活动，29.6% 的村民参加了居民自组织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村民未参加社区合作性的活动，而参与自组织者多于参与政府组织活动的人。需要说明的是，同时参加基层政府组织和村民自组织的恢复活动的样本共有 29 人，仅占总样本数的 5.20%，即使将其纳入模型也无法得出显著的结果，因此，也基于模型简明性的考虑，将

这一类型的样本去除。换言之，在以后的模型中，只有 24.4% 的“纯粹”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参加者被计入“自组织”模型，同样的，也只有“纯粹”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灾后恢复活动者被计入“政府组织”模型。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村民的社会网络，问卷设计了四种村民的社会网络：工具网、情感网、干部网和拜年网。前三种网络的测量主要使用了姓名生成法 (name generator)。工具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村民灾后向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帮助（例如借钱或物品、帮忙农活、建房子、看小孩等）的人的相关情况；情感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村民灾后可以与之谈心和聊私密话题的人的相关情况；干部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和村民有交情和帮过忙的基层干部的相关情况。通过上述询问到的情况，分别计算三种网络的本村人规模——样本回答该网络中的是本村人的数目，网络的总体规模——样本回答该网络中的人数，以及网络强关系比例，也就是亲戚和邻居等关系在网络中的比重。由于情感网的本村人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和工具网的本村人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显著相关（这主要是因为部分村民两种网络有一些重合），为避免回归中共线性问题，我们对这两个网络的本村人网络规模和强关系比例进行了均值化处理，得到了关系网本村人规模和关系网强关系比例这两个变量。关系网本村人规模对应的是前面假设中的社区关系网络规模。干部网方面由于衡量的是个人社会资本，对是不是本村人并不关心，因此关注的是其总体规模与强关系比例⁽⁷⁾，而非本村人的规模，因为是强关系才容易动员干部网内的资源。拜年网的测量使用的是位置生成法 (position generator)，询问了村民春节期间有拜年往来的人的相关情况。

此外，笔者还设计了一套量表用以测量村民的“本村认同感”，并对这 22 道题目的得分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应的题目，将分析出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区归属感”“社区意识”和“邻里亲密”，分别计算了每位村民的各因子得分，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这里将第一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作为测量社区认同感的指标。

3. 控制变量

为廓清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主要是村民个人特征变量，分别是年龄、教育年限、家庭抚养系数

——家中人老人小孩所占比例、性别、是否党员、和婚姻状况。一般而言，较弱勢的群体较没有能力参加集体合作的活动，并且我们认为党员身份有助于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

(三) 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情况”是分类变量，故不适用于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因而笔者构造了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此种回归模型首先是将因变量转换为一个事件发生 / 不发生的概率发生比，再来考察自变量对发生比的影响。

四、结果分析

(一) 控制变量

国外有关中国社区参与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乡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居民收入、教育程度与社区参与程度都呈正相关关系 (Plummer & Taylor, 2004b)，即个人的收入越高，受教育年数愈长，就越可能拥有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丰富的社会资本，也更容易融入周围的生活环境，因而对于社区活动也就会有较高度度的参与 (Halpern, 2005 : 124-132)。但是本文的田野观察与定量研究却揭示了些许不同的社会事实。从社会经济背景看，受教育年数与“村民自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符合一般理论预期，但与“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不相关。相反地，社会上较弱勢的团体，包括女性、老年、家中抚养人口多的，并不显著地拒绝参加自组织活动，而其中女性与抚养系数高的村民则明显不愿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这可能原因是，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村民越不是政府动员的对象，从政府动员三十到五十间的男性较其他类属群体为多，可以窥见一般。但也可能女性及抚养系数高的弱势群体不把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作为一种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通道与机会，所以较不接受动员。

(二) 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此外，不少研究者指出，社区成员对其所处社区活动或组织的参与正是认同的实际行为呈现。社区认同有助于社区成员之间情感连结的加强，更可以为社区的集体行动提供动力，从而促进社区参与 (Glynn, 1981 ; Abbott, 1995 ; 陈金贵, 1992)。通过模型可以发现，对村庄有较高认同感 / 归属感的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的发生比更高，本模型在“本村认同感”变量上的回归系数为 0.018，统计上显著，

表 1：变量描述统计表

| 变量名 | 变量类别 | 变量说明 | 均值或百分比 | 标准差 |
|------------------|------|--|---------------------------------|--------|
| 因变量 | | | | |
| 村民参与灾后救援或恢复活动的情况 | 定类变量 | 0 = 未参加, 1 = 参加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救援或恢复活动 2 = 参加由村民自组织的救援或重建活动 3 = 两类都参加 | 57.2% 13.3% 24.4% 5.2% | — |
| 控制变量 | | | | |
| 性别 | 定类变量 | 0 = 女, 1 = 男 | 0.570 | 0.496 |
| 年龄 | 定距变量 | | 49.760 | 13.047 |
| 是否党员 | 定类变量 | 0 = 非党员, 1 = 党员 | 0.068 | 0.252 |
| 教育年限 | 定距变量 | | 5.114 | 3.926 |
| 婚姻状况 | 定类变量 | 0 = 未婚, 1 = 已婚或离异或丧偶 | 0.943 | 0.233 |
| 家庭抚养系数 | 定距变量 | 老人和儿童在家庭成员中所占比例, 0-1, “1” 为全部是老人和儿童 | 0.273 | 0.332 |
| 认知型社会资本 | | | | |
| 社区归属感 | 定距变量 | 对本村的认同程度 / 归属感 | 45.887 | 19.614 |
| 关系型社会资本 | | | | |
| 关系网本村人规模 | 定距变量 | 工具网、情感网中本村人关系总数的均值 | 1.692 | 1.186 |
| 本村人信任程度 | 定距变量 | 分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 分别从 4 到 1 进行赋值 | 3.246 | 0.556 |
| 结构型社会资本 | | | | |
| 关系网强关系 | 定距变量 | “亲戚、邻居”在工具网、情感网总规模中所占比例的均值, 0-1, “1” 为网络成员全部是亲戚和邻居 | 0.828 | 0.251 |
| 个人社会资本 | | | | |
| 干部网规模 | 定距变量 | 干部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 2.588 | 1.450 |
| 干部网络强关系 | 定距变量 | “亲戚、朋友”在干部网中所占的比例, 0-1, “1” 为网络成员全部是亲友 | 0.060 | 0.189 |
| 拜年网规模 | 定距变量 | 拜年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 24.387 | 19.186 |

从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1。而“本村认同感 / 归属感”对于“政府组织的重建活动”并不显著。

(三) 关系 / 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对于自组织的重建活动——“社区志愿性活动”，模型在“关系网本村人规模”、“本村人信任程度”“关系网络强关系”这三个变量上的回归中在统计上都不正向显著，这说明村民在村庄内既有的社会网络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并没有明显的积极支持作用，本文提出的假设 2-1, 2-2 以及 3 并未得到支持。但“关系网络强关系”对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重建活动负向显著，这虽不在本文的理论假设之中，但却值得注意。“关系网络强关系”反映的是村民社会

网络中的熟人（亲戚、邻居）关系所占的比重，即强关系。密网（dense network）中信息的传播可能会有放大、濡染的作用（Krackhardt, 1993）。模型中显示这些强关系对政府组织的重建活动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说明密网之间可能传播了一些关于此的负面信息。

(四) 个体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活动的影响

对于“自组织的重建活动”，本模型在“干部网络强关系”变量上的回归系数为 -2.220，统计上显著。即如果村民的干部关系网中较多是强关系，那么其志愿性社区活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村民的干部网络对于村民参与志愿性社区活动（自组织）具有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所以假设 4-1 成立。而与此形成鲜明

表 2：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参与灾后救援或恢复活动”影响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 | 政府组织 | | 自组织 | |
|--------------------|------------|-------|-----------|-------|
| | 回归系数 | 标准误 | 回归系数 | 标准误 |
| 控制变量 | | | | |
| 性别 (女性) | -1.098*** | 0.340 | -0.240 | 0.243 |
| 年龄 | -0.017 | 0.016 | -0.016 | 0.012 |
| 党员身份 (非党员) | -0.063 | 0.561 | 0.432 | 0.514 |
| 教育年限 | 0.041 | 0.046 | 0.078** | 0.036 |
| 婚姻状况 (未婚) | 0.009 | 0.604 | -0.930 | 0.613 |
| 家庭抚养系数 | -1.813*** | 0.642 | -0.548 | 0.441 |
| 认知型社会资本 | | | | |
| 社区归属感 | 0.010 | 0.008 | 0.018*** | 0.006 |
| 关系型社会资本 | | | | |
| 关系网本村人规模 | -0.013 | 0.127 | -0.197 | 0.104 |
| 本村人信任程度 | -0.150 | 0.270 | -0.191 | 0.211 |
| 结构型社会资本 | | | | |
| 关系网强关系 | -1.267** | 0.546 | -0.331 | 0.472 |
| 个人社会资本 | | | | |
| 干部网规模 | 0.315*** | 0.114 | 0.199 | 0.084 |
| 干部网络强关系 | -0.971 | 0.775 | -2.220*** | 0.811 |
| 拜年网规模 | -0.008 | 0.009 | 0.012** | 0.006 |
| Intercept | 0.411 | 1.442 | -0.930 | 1.128 |
| Chi Square | 110.952*** | | | |
| - 2 Log likelihood | 199.053 | | | |
| N | 493 | | | |

注: 1. 单尾检定, *: $p < .05$; **: $p < .025$; ***: $p < .01$ 。

2. 社会网络及其它变量对村民参与灾后救援或恢复活动的影响(以“未参加”为参照)

对比,“干部网规模”对于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却具有正面作用,回归系数为 0.315,统计上显著。假设 4-2 也被数据验证。可见“干部网”在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和政府组织的活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拜年网规模来说,其对自组织重建活动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支持了假设 4-3。但好的拜年网内的个人社会资本却对基层政府组织活动没影响,假设 4-4 不成立。

五、讨论

对于灾后恢复活动这一重大的社区公共事项,基层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所动员的社区成员同村民自组织所动员的社区成员在社会特征上有很大差异性。以往的研究通常是一般性地讨论社区居民社会特征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没有将基层政府的动员因素纳入进来。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干部网络的影响确实显著,一个干部网中强关系的比例高的人,也就是有较多亲戚朋友是干部者,可能更容易取得更多的

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较不倾向参与自发的互助性集体行动。数据分析还显示,干部网的规模对于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具有正面作用,这说明村民与基层政府有较多关系者可以被动员参加政府组织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不同的是,干部网强关系对政府组织的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他们有足够的亲戚邻居帮助动员干部网中的资源,所以不太需要参加基层政府,主要是村委,组织的活动,以拉近和村干部的关系,因此可能不接受动员。

在情感网及工具网上,似乎是关系网络的强关系对动员村民参加自组织无显著影响,不如理论预期,但对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的活动却有着负面的影响,可见乡村中是亲朋这类强关系的动员力量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变量对自组织活动就没有显著影响。配合了另外一个现象——很少人人同时参与政府组织的与自组织的救灾重建活动(5.20%),我们怀疑,政府组织和社区自组织动员着两个不同的关系网,而这两

群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分隔的。换言之，和基层政府（干部）熟识的一群人与社区内的乡里乡亲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得到一个假设，村中居民因为基层政府权力的介入已分裂为两个群体。这是将来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的资料并不足以验证此假设。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深深嵌入在村中关系网内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能到外面打工，认识较多外面关系的人，也就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所以他们虽深深嵌入在社区中，却较无能力参加社区自组织活动。相反的，他们却不是政府要动员的对向，所以对参加政府组织活动负向影响。

在社区认同上，本文也得到了显著的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同。综上所述，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的动员网络有较大的区隔，甚至可以怀疑在各自主导的重建活动上是互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基层政府的确在灾后恢复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也往往会对村庄自身的自组织力量产生负面影响。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自治治理顺利运作的条件包括“社群的成员必须维持一种自力更生的态度，公共官员必须满足于在一个具有多个权威和交叠管辖单位的多中心体制中运作”，“公共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其所控制的各种资源的范围”则是自治可持续性的威胁（麦金尼斯和奥斯特罗姆，2003）。这些分析结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对灾后恢复过程影响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基层政府在灾后恢复和村庄发展中的作用与自身定位。

注

(1)* 作者1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1: LUO Jar-D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jdluo@mail.tsinghua.edu.cn。作者2 方震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2: FANG Zhenp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 本研究受清华大学一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项目 (041913016) 资助。[This study is found by Tsinghua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041913016)]。

(2) 自组织是一群基于自愿的原则主动地结合在一起，它有以下特性：(1) 一群人基于关系与信任而自愿地结合在一起。(2) 结合的群体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3) 为了管理集体行动而自定规则、自我管理。与自组织的概念相对的概念是他组织。他组织是指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群人组织起来，以完成一项被赋予的任务。（罗家德，2010）

(3) 调查中询问的村民参与的“重建活动”是指具有社区性、公共性和互助性的重建活动，如救援、巡逻、邻里互助、清理废墟、修建公共设施等。

(4) 昆兰特里 (Quarantelli) 将灾难迷思归为三类，第一类称为“灾民恐慌”迷思 (panic image)，即认为灾民在灾难之中将会出现无组织的逃离行为，会因潜在的危险而歇斯

底里。救灾单位基于这样的预设，往往会限制灾害相关信息发布与传播，以避免民众恐慌，造成不必要社会的混乱。事实上，“灾民恐慌”常常是短时现象，灾民在灾难之前的社会角色 (social roles) 依然持续发挥着作用，慌乱也因此而平复。第二类称为“灾民依赖”迷思 (dependence image)，即认为灾民只会被动地等待救援。此迷思来源于认为受到灾难冲击的民众必然会产生灾难症候群 (disaster syndromes)，可是研究显示灾难症候群也只是暂时现象，大多数灾民都会积极主动地进行灾后恢复活动。第三类称为“控制大局”迷思 (control image)，这类迷思是基于前两者之上，也就是由于灾民的恐慌行为与被动等待，所以只能依赖国家才能控制与应对灾难的不良后果，而国家也总是能找到方法与手段，实现它所预设灾后恢复的目标，这项迷思预设灾前的社区认同与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 会因为灾难瓦解。

- (5) Gittel 与 Vidal (1998: 15-20)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内聚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另一是“桥接型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参与各有不同的意涵和效用，内聚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亲戚或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大多为熟人关系，它有助于增强较小范围的社区参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则是指与较疏远的朋友或同侪之间的关系，能够连结外部资源并促进信息的流动。广泛的社区参与就是要使“桥接型社会资本”增多，使信任不局限于亲密团体之内。
- (6) 什邡市、绵竹市以及本文田野调查地茂县同为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十大极重灾区。
- (7) 干部网强关系比例的计算与关系网强关系比例略有不同，计算的是亲戚、朋友在干部网总规模所占的比例，而不强调邻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ference)

- Abbott, J. 1995.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30(2): 158-168.
- Burt, R. S. 1997.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2): 339-365.
- 蔡宏进, 1985, 社区原理, 台北: 三民书局。[Can, HongJin. 1990. *Principles of Community*. TaiPei: San Min Press.]
- 陈开琦. 2009. 地震灾后重建与宅基地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3). [CHEN Kaiqi. 2009. "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Sites Policy." *Social Science Studies* (3). (in Chinese)]
- 陈金贵. 1992. 公民参与的研究. 行政学报 (24). [CHEN Jingui. 1992.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search."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Journal* (24). (in Chinese)]
- Coleman, Jame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 Dombrowsky, Wolf. R. 1983. "Solidarity during Snow-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189-205.
- Drabek, T. and W. Key.1984. *Conquering Disaster: Family Recovery and Long Term Consequences*. New York: Irvington.
- Gilbert, C. 1998. "Studying Disaster: Changes in the Main Conceptual Tools." In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edited by Quarantelli, E.L.London: Routledge.

- Gittel, R. and A. Vidal.1998. *Community Organiz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California: Sage.
- Glynn, Thomas J. 1981.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Human Relations* 34(7): 789-818.
-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360-1380.
- Green, G. P. and A.Haines.2002. *Asset Build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alifornia: Sage.
- Halpern, 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cy Press.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974.
- Killian, L.M. 1954. "Some accomplishments and some needs in disaster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0(3): 66-72.
- Krackhardt, D.1992.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 edited by Nohria, N. and R.G. Eccle.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Krackhardt, D. and Hanson J. R., "Informal Networks: The Company Behind the Char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3, pp. 104-111.
- Luo, Jar-Der, "Particularistic Trust and General Trust—A Network Analysis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 2005, Vol 3:437-458
- 迈克尔, 麦金尼斯,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2003. 从追求民主到自主治理 // 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 王焱, 编. 北京: 三联书店. [Michael, McGinnis and Vincent Ostrom. 2003. "From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to Self-organization." In *Constitutionalism an the Modern State*, edited by WANG Y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Moore, H.E. 1958. *Tornadoes over Texa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Nahapiet, J.and S.Ghoshal. 1998.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242-266.
- Nakagawa, Y. and R. Shaw. 2004. "Social Capital: A Missing Link to Disaster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2(1): 5-34.
- Quarantelli, E.L.1960. "Images of Withdrawal Behavior in Disasters:Some Basic Misconceptions." *Social Problems* (8):68-69.
- Quarantelli,E. L.1989. "Conceptualizing Disaster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7(3): 243-251.
- Patterson, Olivia, Frederick Weil, and Kavita Patel. 2010.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Disaster Response: Conceptual Model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9): 127-141.
- Paul, S. 1987.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World Bank.
- Plummer, J. and J. G.Taylor.2004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ssues and Processes for Capacity Building*, edited by Plummer, J. and J. G. Taylor. London: Earthscan.
- Plummer, J. and J. G. Taylor.2004b. "Key Factors and Processes Affecting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ssues and Processes for Capacity Building*, edited by Plummer, J. and J. G. Taylor. London: Earthscan.
- Putnam, R. D.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4(13):1-11.
- Putnam, R.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4): 664-683.
- Schafft, K. A,and D. L. Brown.2000. "Social Capital and Grassroot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Roma Self-Governance in Hungary." *Social Problems* 47(2): 201-219.
- Schuller, T., S.Baron, and J.Field.2000. "Social Capital: A Review and Critique." In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Baron, S., J. Field, and T.Schu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ng, Y. K. 1989.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Low-Income Housing Projects: Problems*. Kenya: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 Soloman , S. 1986. "Mobiliz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Times of Disaster." In,Trauma and its Wake : Vol . 2. *Traumatic Stress Theory , Research , and Intervention* ,edited by Figley , C. New York :Brunner PMazel .
- 汤京平、黄诗涵、黄坤山. 2009. 灾后重建政策与诱因排挤——以九二一地震后某社区营造集体行动为例. 政治学报 (48). [TANG,Ching-Ping,Shin-Han Huang, and Kuen-Shan Huang. 2009. "Post-Disaster Rehabilitation Policy and Incentive Crowding-out: A Case Study on the Community-building Collective Action after Chi-Chi Earthquake." *Journal of Politics* (48). (in Chinese)]
- Tierney, K. J. 2007.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503-525.
- Tsai, W.and S.Ghoshal.1998.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 464-478.
- Uphoff, Norman T. 1996. *Learning from Ga I Oya: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Post-Newtonian Social Science*.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 王颖、董垒. 2010. 中国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持模式初探——以各省市援建汶川地震灾区为例.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 [WANG Ying and DONG Lei. 2010. "The Modes of Counterparts to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Wenchuan Post-disaster Recovery."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1). (in Chinese)]
- Yamagishi, Toshio, Karen Cook, and Motoki Watabe. 1998. "Uncertainty, Trust, and Commitment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65-195.
- Yamagishi, Toshio and Midori Yamagishi.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2): 129-166.
- 赵延东. 2007. 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5). [ZHAO Yandong. 2007. "Social Capital and Post-Disaster Recovery :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Natural Disaster." *Sociological Studies* (5). (in Chinese)]